

有一回,在飞机上,一名五六岁的小童因为穷极无聊而不断地用脚踢前面的椅子,一下、两下、三下、无数下,我就好像坐在颠颠簸簸的小舟里,晕头转向。在忍忍忍而无法重新再忍的情况下,转过身,礼貌地要求他不要再踢。可我一坐下来,便听到他大声说道:“前面那个人好讨厌啊!”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母亲竟细声附和:“是啊,真是讨厌,别理她!”

我默默地想,在这种是非不辨的家庭教育下,男童今天踢的是椅子,将来或许便会毫无分寸地踹在别人的心叶上。当他狠狠地踹着别人时,他的脚板,长着一块无知无觉的茧;而这块厚厚的茧,是自小在父母的助长下形成的啊!

另有一回,在大庭广众里,看到了一幕让我心重如铅的“人间闹剧”。



走路的云

我去常州寻他,是因为他也在寻我。他叫徐秉言,中国当代竹工艺大师。

他先是向朋友要我的电话,后又向嘉定竹人张伟忠打听。伟忠告诉我时,秉言正在嘉定参加上海博物馆的活动。我从外地回来,未进家门便直奔秉言而去。“徐老师,我也想你呵!”我紧握住他手,觉相见恨晚。临别,仍意犹未尽,依依不舍。

三个月后,他来看我,徐氏竹刻第三代传人徐风开的车。再次相见,我喜欢不已,却不巧殷慧芬偶染小恙,在医院挂针,两天后还得去欧洲。我无法作陪很觉歉意。旅欧回来,张伟忠说:“秉言师一直在牵挂,不知嫂夫人身体好点了吗?去欧洲一路会不会太累?”我听了大为感动,当即打电话谢他,并说择日去看他。于是便有了此次常州之行。

秉言寻“他”

楼耀福

同行的是殷慧芬、张伟忠等。寻到他湖塘府上,他老伴说他专门去淹城为我们取入场券了。我们在他屋里转悠,看他的竹刻木雕,看他画的白菜果蔬,看他壶上刻的兰花竹叶。待他回来,对他近期的创作已有了大体的了解。

秉言给我们看两件他年轻时的作品,一件是刻在白色有机玻璃上的程十发人物画,栩栩如生。秉言请程十发看过,十发老人夸赞不已,说他把原作中的笔墨轻重疏密都用刀表现出来了,很难得。之后,老人把自己新作借给秉言,供他作绘刻底稿。另一件作品是秉言刻在塑壳保暖杯上的,那杯是他老丈人用的,由于年代久远,盖子已破损。秉言说,我那时喜欢刻,却无用武之地。于是,拿到什么就刻,有机玻璃、塑料杯都是。我不无感叹。

秉言自幼受父亲徐素白影响,喜欢书画、竹刻,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塑料制品厂,刻产品烟灰缸,每天千余只。之后,他就读无锡轻工学院造型美术系,系统学习中国画和艺术理论。秉言刻竹极富造诣。小小竹片有时让秉言意犹未尽,于是他听程十发等大师建议,在红木雕刻上笔墨酣畅地施展才情,被艺术界誉为“一枝独秀”,名播海内外。

如今秉言年已七旬,在艺术道路上,探求的脚步却始终未停,近些年在壶刻领域也令人刮目相看。互联网有文说:“一些雕刻大师的作品,比如江南雕刻大师徐秉言的手工刻壶,更是价值不菲,经常在拍卖会上拍出天价。”他与顾治培、周晓琴、尹建平平等壶艺家合作的多件作品为海内外名家所称道和收藏。虽如此,他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宜兴,秉言让我看他的作品,却总在找他自己不满意之处,“这一刀还可以刻得‘杀格’一点”、“这一瓣兰花叶片还可以稍稍往下一些”,如此等等,言语、表情十分平常淡然。我听着感动,相比有些人稍有成绩,牛逼烘烘,尾巴翘上天,听不得半句批评话,秉言却无,并总寻着自己的不足。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年轻壶艺家王星茗、周玉霞夫妇研制了一款新壶,形如鸳鸯,想让秉言绘刻。坐在车上,秉言不断与小王探讨,说他想刻荷花荷叶,一鸳鸯被荷叶半掩遮。一车人听了都说好。秉言说:“刻什么字我还没想好。”殷慧芬一听,脱口而出:“就两个字:寻他。”又补充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句子。”秉言说:“好,有意境。”

他说这话的时候又一回让我感受到他骨子里善于倾听的谦和恭让。秉言寻“他”,寻了大半辈子,寻的是艺术的至臻意境。



夜光杯

一名约莫七岁的男孩,站在池塘旁嬉戏。池塘里,多尾锦鲤以缤纷的色彩织出了让人心醉的斑斓图景。小男孩拿着一大包油腻腻的炸薯条,双手一翻,便想倒进池塘里,佣人眼尖,劈手夺下。男孩非常生气,飞起一脚,结结实实地踢在佣人的膝盖上。佣人吃痛,颤声说道:“我去告诉你妈妈!”小男孩问:“你说你要告诉我妈妈?”佣人说:“是啊!”小男孩有恃无恐,又提起腿来,连续踢了佣人两三步,边踢边说:“你去讲啊,我让你讲个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女主人出现了,她气定神闲地喊着:“汤尼,你在玩个啥呀?”瞧瞧瞧,儿子出了狠劲在踢佣人,佣人被踢得龇牙咧嘴,落在她眼里,竟是一场无关痛痒的游戏!

小男孩今日踢的是佣人,他日,

踢

(新加坡) 尤今

再有一次,一名穿了校服的小童,在妈妈的陪同下,一蹦一跳地在路上走着。路旁,躺了一只野猫,病菌像烟气一样缠绕在它软绵绵的躯体上。小童经过它身边,说时迟,那时快,抡起脚猛力踢去,病猫闷哼一声,像棉絮般的身子飞得老远,当它跌落地面时,我仿佛听到香消玉殒的声音。实在气不过,我大步上前,对男童说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猫……”话还没有说完,男童的母亲便气急败坏地抢着对他说道:“是啊是啊,我和你说过的呀,不要随便去踢这些脏脏脏的野猫野狗,它们如果被你踢痛了,会咬你的呀!你怎么不顾危险呢!”我一听,整颗心都凉了、瘪了。孩子踢猫踢狗,

是任意蹂躏其他生灵의丑恶行径,她没有教导孩子尊重生命之道,却把训斥重点引到其他层面上!

一个惯常用脚把其他生命踢个稀烂的孩子,胸腔里的那颗心,慢慢会变得僵硬,像石、像铁。成长之后,在职场上,或者,在黑社会里,他可能时时会使出“连环三脚”,冷酷无情地滥杀无辜。

踢,是人类的本能。婴孩呱呱坠地不久,便已懂得了用那双粉嫩粉嫩的腿,一下一下地踢进空气里,快乐而惬意。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教导孩子如何踢、踢什么、该不该踢,通通都是父母的责任。

睿智的父母,会教孩子以坚韧的毅力踢掉妨碍成长与成功的各种困难;然而,溺爱孩子的父母,却放任孩子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去踢,小则踢椅子,大则踢生命,最后,把自己的品德与人格都踢掉了。

当时孙家离皇城很近,翁同龢则住得较远,为了应对第二天的殿试,翁同龢本想早点休息。不料却接到孙家以通家之谊的名义,执意邀请他当晚光临便宴。翁同龢百般推却不得,只能前往。当晚在孙家,父执辈的孙瑞珍一边频频向翁劝酒,一边不

所谓“大人”

陆其国

受到清廷重用。咸丰六年(1856),孙毓汶、翁同龢同举进士参加殿试。殿试是科举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担任主考官。殿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赐进士及第。按实力,人们普遍认定,这一科状元不是孙毓汶就是翁同龢,其他没人有能力和他俩PK。孙毓汶有个哥哥曾在道光二十年(1840)中过状元,所以孙家很希望毓汶能成为是科状元,创出“兄弟状元”的佳话。

才让翁回家休息。而此时孙瑞珍的儿子孙毓汶却早已进入梦乡。翁回到住处,刚想安睡,忽又被外面骤然响起的爆竹声吓了一跳;爆竹声时续时停,整整闹了一宿,搅得他一夜没能入眠。第二天入朝殿试时,翁觉得“已困顿无气力矣”。拿到试卷后,更感觉“执笔毫无精神。自以为此次状元,属孙莱山(毓汶)必无疑问”。但奇迹出现了:翁在装试卷的卷袋中,居然摸出了两支小小的人参。“乃含人口中”。人参入口,翁顿时感到似有“精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直书,手不停挥,一气到底,无一懈笔”。这时候翁“始悟孙家延(请)饭,深谈入夜,使之疲倦,燃放爆竹终宵,使(他)不能入睡,皆为翌日书殿试策,(让他)无精采

感怀

贾立夫

蹉跎岁月乱麻缠,
考量人生始信禅。
贵贱犹如过眼景,
毁誉只当听秋蝉。

纷繁尘事抛云外,
煮字赋辞别有天。
夜半无眠邀皎月,
近山远水幻成仙。



玫瑰之梦

(水彩画) 俞理

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都发源于苏州,其说、噱、演是共同的。只是弹词兼具弹唱。因此,二者的书目取材不同。表演风格上,评话偏于粗犷豪放,弹词偏于纤细婉约。

张鸿声是近代评话艺术家中的佼佼者。他1908年出生于苏州阊门。小学毕业后曾就读于苏州博文中学校,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1924年正式拜师评话名家蒋一飞,学说传统长篇《大明英烈传》。

张鸿声天资聪颖,学艺勤奋,一年后即出道演出。之后,仍访师求教,观摩道中演出,虚心听取意见。二十岁出头,进入上海,凭着青年的朝气和进取心,受海派文化“革新创造,跟上时代”的影响,力避一般评话拖沓冗长的弊病,使书路进展得快,书情精炼集中,受到上海尤其是年轻听众的欢迎,被誉为“飞机英烈”。(飞机是当时最快速的新兴运载工具)。后来,张鸿声将此总结为评弹演出必须讲究“书性、地性、时间性”的结合,也就是说要根据书情特性,当地当时听众的口味、需求来进行艺术创造。

人物塑造是评话演出的一个要素。张鸿声善于形象思维,善于创造角色。经他表演的历史和现代人物如《海上英雄》的苗科长、《江南春潮》的敌轮机长、《白虎岭》的猪八戒、《林冲》的鲁智深都在听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塑造的传统长篇《英烈传》的胡大海。他突破了传统评话中对所谓“戇大”角色的类型化表演,在

“胡大海”张鸿声

吴宗锡

生活中观察吸收了许多类似胡大海性格的人物,终于将胡大海这个“书中之胆”塑造成了一位天真率直,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却又喜耍小聪明,爱占小便宜的可爱的喜剧人物。其实,张鸿声自己也是一个宅心仁厚,颇具慈爱心的人。或许由于张鸿声长期在书台上表演胡大海角色,也或许他在塑造胡大海中融注了自己的性格、爱憎,使他与书中人物



夜光杯

曾卓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和诗人。这与他毕生手不释卷、酷爱读书是分不开的。他那本获得过全国优秀散文奖的散文名著《听笛人手记》,其实就是一部文采斐然的“读书记”,但比一般的“书话”文章更具个人感情色彩和散文风格。他所独创的这种散文文体,对后来许多作家的书话散文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听笛人手记》每一篇读书笔记里所注明的原著或文本出处,我们看到,他所读的书有不少都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版本,这说明,他从三十年代刚刚踏上文学之路时,就喜欢买书和读书了。他在写给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的一封信里曾经说到,他自己原本也是有不少藏书的,但是经过了历次的“运动”之后,这些旧藏几乎散失殆尽,不过也还幸运地留下了一点旧书,他在信上对姜德明先生说,如果来武汉,欢迎来舍下“检取”几册自己所喜欢的,云云。这也说明,他确实是藏过一些旧书的。

曾卓先生生前,我曾有机会多次到他在汉口鄂城墩台北一村的寓所里听他谈诗、回忆往事。他领着我到一个封闭的阳台上看过他的藏书,给我印象是,他的藏书虽然不是很多,但有不少老版本,而且以现代作家在解放前出版的集子和外国文学的旧译本居多。他也曾送给我一些现代作家的签名本,如邹荻帆、黄裳、温源宁的集子。

曾卓先生晚年,还曾参与甚至亲自动手编辑过一些书。例如他的老朋友、诗人胡天风去世前,把全部遗稿托付给了他。曾卓自己动手编选并作序,出版了《天风诗草》(长江文艺出版社)。

他还给武汉出版社主编了一套《跋涉者文丛》,先后出版了两辑共十四册,作者有严文井、牧惠、邵燕祥、鲁光、何满子、绿原、牛汉、谢蔚明、倪墨炎、刘绪源、周翼南等。

承蒙曾卓老师鼓励和爱护,让我也忝列其中,出了一本《书房斜阳》。我这本读书散文集的选目,就是曾卓先生亲自遴选的。记得他还给我仔细解释了他为什么要选这些篇目而舍弃另外一些篇目的理由,让我感到了他作为一个“选家”和编书者的目光的精准,真是心服口服了。“顾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足惊人”(王安石句)。这本《书房斜阳》也使我心中永远铭记和感激敬爱的曾卓先生对我的器重和爱护。

气力地步,孙莱山可独占鳌头矣”。但是两支小小的人参使情况发生改变,翁嚼之精神陡增,一口气做完试卷,并充满自信地说:“此可压倒莱山,笔意妙到秋毫颠,尚在兴酣落笔时也。”果然,揭榜后状元属翁,榜眼为孙。翁也因此被人们戏称为“人参状元”。认真想来,人参在试卷袋中出现颇让人生疑,外人所为可能性非常小,说是翁自己“作弊”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更顺理成章。但不管怎么

样,翁在此举上毕竟击败了孙。而孙、翁两家由于这件事,从此“芥蒂甚深。说者谓瑞珍不应出此(小人动作),非君子所为”。其实“大人”本来就未必都是君子,如果因为他们“大人”,便以君子的行为准则要求他们,实在是抬举了所谓“大人”。比如说孙瑞珍孙大人。事实上像孙瑞珍这样的“大人”(包括某些“芝麻绿豆官”),因为头上有顶“乌纱帽”,便自视为“大人”的,古今皆不乏其人。这些人对上惯于阿谀奉承,有时也会撒娇、使性子;对下则以顺逆为臧否,甚至使出一些漠视及践踏下属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些所谓“大人”,实该自省,同时也值得他人引为警戒。

胡大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故人称他“活胡大海”。连评弹知音陈云同志听了他的演出后,也称他为“胡大海”。

噱是评弹表演的主要手段之一。评弹艺人有“噱乃书中之宝”的艺谚。放噱也是张鸿声的特长。他善于从群众生活中,观察提炼放噱的素材,也善于用语言、面风,表演各种长短噱头,人称“噱头大王”。他有个得意的噱头,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大选,电台里整天唱着候选人的名字“李宗仁孙科”。他上了台对听众说:他们叫得起劲,“李宗仁孙科”,却不知其实“佷种人真苦”。引得全场听众开怀大笑。

张鸿声成为大响档,尤其在参加上海评弹团之后,摆脱了名利的羁绊,一心投入于艺术创造,进入了以艺术娱悦听众,同时又以艺术自娱的境界。他在演出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禀赋、才能,享受着艺术创造和表演的乐趣。

十日谈

评弹群星谱

吴子安刻苦勤学,二十岁便在上海崭露头角。请看明日介绍。